政策规划

智力资本如何提升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

——基于fsQCA的实证分析

居 佳

（北京开放大学首都终身教育研究基地，北京 100081）

摘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承接国家意志、推动政策塑造层面贡献大量智慧，当前高校智库迎来建设黄金期，但如何突破“有量缺效”的决策服务困境已成为亟待探讨的问题。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的双重逻辑，系统论证智力资本框架与高校智库运行机理的内在契合性，构建“人力-结构-社会”三维智力资本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北京18所高校智库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知识网络驱动型、知识内化反馈型、知识联动赋能型三类提升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创新模式，证实学科优势是核心基础要素，但其效能的发挥依赖于与不同智力资本组合的匹配。不仅拓展了智力资本理论在政策科学中的应用，更为高校智库差异化发挥其决策服务功能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智力资本；fsQCA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8－0265－07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综合实力不再局限于科技、经济与军事的较量，软实力的竞争也成为新的关键，智库不可避免地被视作塑造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支柱[1]。201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一战略部署标志智库建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顶层设计。在实践层面，中国已形成高校智库、官方智库和社会智库协同发展的多元格局，这些智库机构共同构成服务政府科学决策的智力支持体系。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和《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为推进高校智库建设的规范化进程与专业化发展路径构建了完整的政策框架体系及制度保障机制。截至2025年4月，在中国智库索引（Chinese Think Tank Index，CTTI）收录的985家智库中，高校智库占六成，据统计发现，近年来高校智库的研究选题更加聚焦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服务国家发展方面的意识愈发强烈，但在影响公共政策的成效方面仍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关于智库影响力的维度划分，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即便分类标准千差万别，但决策影响力占据的核心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2]。提升智库决策影响力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刘健和陈竣[3]基于扎根理论，识别出内外部环境、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信息技术资源等是影响高校智库建设的关键因素。邹然[4]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了社会智库通过结构和关系双元维度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路径与机制。胡薇和牛鸣灏[5]在资源依赖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声誉、人才、传播等资源对智库影响力提升的作用路径。现有研究为理解高校智库高质量服务决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即便服务决策已被证实是智库的核心作用之一，当前研究未充分聚焦在决策影响力方面的研究；二是尽管部分研究也强调了前因变量的作用，但智库服务决策的知识属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三是通过概念性框架的构建、单个案例的总结等方法开展研究，要么过于宽泛，要么有明显的侧重，能否进行结论的拓展很难给出清晰的评价。鉴于此，研究拟聚焦高校智库，基于知识生产与扩散的核心功能，立足智力资本视角，系统捕捉智库决策影响力的提升

收稿日期：2025-10-21

基金项目：北京开放大学校级重点课题（SX2025002，SX2024001）

作者简介：居佳（1991—），女，江苏高邮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智库管理、知识管理。

因素，探究如何通过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增强其对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影响，以期提升高校智库研究成果的直接转化率，深化其对决策理念的长期塑造力，为高校智库查漏补缺、改善决策服务质量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1 理论基础

1.1 智库决策影响力

智库决策影响力是指智库通过研究分析、政策建议、舆论引导和关系构建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或其他权力主体的政策制定或战略选择的能力。核心在于智库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中介机构，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可操作的决策方案。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

实践方面，国内外主流机构对智库决策影响力的评价主要以批示、采纳、讨论、培训决策者等内容为主。其中，以CTTI为代表，将批示与研究报告作为主要指标；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中国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attractive power-management power impact power，AMI）为代表，包括决策层对成果的采纳率、曾经服务于政府的人数占比、离开机构服务于政府的人数占比等指标；McGann[6]表明，智库聘请顶尖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能力、为决策者提供咨询的频率，以及智库成员担任决策者顾问的情况，都是评估智库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标准。理论方面，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智库决策影响力的研究也在持续涌出。刘娇等[7]将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分为显性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其中显性决策影响力是指智库的研究成果和专门服务于某项决策的咨询建议被决策者在政策、法规、制度等方面采纳和转化；隐性决策影响力指智库形成的研究根基、价值判断、社会舆论作用等在运行过程中对决策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产生间接影响。陆红如等[8]构建了智库决策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研究成果获得上级部门领导批示的频率、提交调查报告的数量、智库专家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的程度以及智库专家受邀为决策者授课的情况四个核心指标。肖欢和刘晓丽[9]聚焦智库研究者，点明了人才在智库决策影响力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上可见，智库决策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已形成多维度探索，既有基于批示采纳、论文专著等显性成果的量化评估，也有关注价值引导、舆论塑造等隐形渗透的质性分析，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研究拟聚焦高校智库，将其服务决策时的角色解读为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理念来源、政策建议书和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估员、政府人才来源以及权威信息源。从本质上分析，智库决策影响力属于话语权力的一种，但和控制力、强制力的区别在于是否通过潜在的方式去转变个体的看法与行动。从实践活动来看，智库借助出版书籍、开展研究课题、提交内参以及参加会议等方式对政策产生影响。

1.2 智力资本对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作用

智力资本是一组“基于知识的资源”，作为在管理和生产过程中长期积累沉淀而成的无形资产，以知识为基石并具有显著增值属性。其核心构成包含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以及关系资本三个基本维度：人力资本体现为组织成员知识储备与专业技能的有机整合；结构资本是组织将内外部知识转化为制度化资产的能力；社会资本是指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知识性资源[10]。智力资本与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存在本质关联，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的高校智库，提升决策影响力的核心资源正是智力资本[11]。这一论断在已有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佐证，邓志超和朱宁波[12]认为，高校智库服务决策是确保独立中立前提下，从社会问题出发，围绕政府决策需求，以学科融合为基础，协同外部多方产出决策咨询产品的知识生产过程。曹婷慧[13]直接指出知识是制约高校智库服务决策的关键所在，并采用知识动员的理论框架，从知识生产、知识中介和知识运用三方面构建了分析高校智库影响力的模型。由此可见，高校智库的决策服务及其影响力生成机制本质上就是智力资本的转化与增值过程，这一特性使它天然适配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该过程的核心特征表现为：以知识需求方的政策诉求为导向，通过知识生产主体与使用主体所处情境的有机整合，实现知识价值的延伸拓展与创新增值，最终完成专业知识向实践应用的系统性转化。深度剖析来看，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决策主体的实际需求，当决策者面临知识储备不足的困境时，往往会寻求专业研究成果或智力支持以填补知识空白，这种需求为具备专业技术背景的专家参与决策过程创造了契机[14]。

从智力资本三维度分析其对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作用机制。首先，高校智库人力资本强调的是学术知识在实践能力上的应用，是智库产出决策成果的关键要素。饶远[15]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了人才在驱动智库知识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郭禹辰和冯雷[16]以知识渗透分析框架为基础，阐述

了决策过程中由于专家群体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渗透不一,会造成决策影响差异化。结合实践思考,随着高校智库对研究人员的引进,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扩大,知识资源也在不断优化升级。高校智库背靠学科建设的支撑,高水平专业知识构建提升了研究人员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易得性,使其能够有更多的知识储备投入决策咨询中,从而提升决策影响力。其次,知识创新活动还容易受到组织内部知识管理效能的影响[17]。陈峰[18]认为,组织管理、人才激励、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创新体制机制的不同将带来智库影响力的差异。刘青等[19]指出,高校智库如果拥有明晰的组织结构和匹配的职能设置能有效提升其成果产出的效率效能。结构资本作为智库能力的支撑平台,能够保障智库研究人员专业水平的发挥,推动智库决策成果的产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高校智库开展知识生产的创新条件。最后,高校智库的社会资本将知识资源嵌入到关系中,不仅包括既有关系,还有后续产生的新的互动网络。刘大伟和庄欣琏[20]提出高校智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关系网络建设的重要性,并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在黏合高校智库内外部关系网络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在实践中,大多数高校智库会通过积极参与和举办专题会议,促进智库内部研究人员加强合作和知识共享,进而产生更多服务决策的创新观点,同时借助智库与外界的对话也可宣传智库的研究成果,输出新的思想和理念,甚至把握相应领域的话语权,参与治理规则、议程等决策的制定。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框架

基于智力资本理论,整合高校智库服务决策的特定情境变量,拟构建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社会资本三个核心维度的决策影响力提升组态分析框架。其中,人力资本维度聚焦研究人员规模与学科优势等核心要素,体现智库的核心竞争力;结构资本维度涵盖组织架构优化与数据库建设等关键环节,反映智库内部资源的配置效率;社会资本维度通过专家会议、媒体传播等渠道,展现智库对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三个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组态效应"产生非线性交互,共同作用于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提升。

2.2　研究方法

不同高校智库服务决策的质量不一,背后包含的过程机理较为复杂,涉及智库本身的资源禀赋、动态能力、社会联结等因素。被选取采用的 fsQCA 是一种整合模糊集理论(fuzzy set theory)与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的混合研究方法论,它通过结合定量分析的精确性和定性研究的深入性,在探索多因素诱导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常应用于探究社会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因果关系[21],目前已在社会科学、管理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考虑到高校智库实地调研取材难度较大,大多数量化数据来源于二手资料,样本搜集范围从实操上来看难以过大,而 fsQCA 在小规模样本分析中也具有明显优势。

2.3　研究样本

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对高校智库服务决策、参与国家治理的需求更为迫切;同时,北京高校众多,"双一流"高校林立,在首都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选取 CTTI2022 年发布的高校智库百强榜中 18 所北京高校智库(表 1)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表 1　CTTI2022 年度高校智库百强榜中北京高校智库

序号	高校智库名称
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3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发展研究基地
4	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院
5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6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8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9	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10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1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12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物流信息化研究基地
13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
14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
15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16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17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1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

2.4　变量设计

结果变量: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基于 CTTI2024 年度智库建设最佳案例推介名单,判定获得标杆案例推介、示范案例和优秀案例推介的高校智库在决策影响力方面的综合表现,赋值 1～5 分,并邀请 3 位在智库建设方面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副教授给出评分修订意见,经过三轮匿名修改达成统一得分意见。

条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人力资本选取智库

研究团队的规模和智库所依托学科实力 2 个变量。其中，智库研究团队包括全职和兼职 2 类成员；学科实力根据上海软科对国内高校学科的排名确定，并进行归一化处理[22]。结构资本选取组织架构和数据库建设两个变量。其中，组织架构使用智库下设研究中心的数量衡量；数据库建设使用高校智库构建的专题数据库的数量衡量[23]。社会资本选取专题会议和媒体传播 2 个变量。其中，专题会议使用高校智库近 3 年举办的专题会议平均数量表示；媒体传播通过使用该智库微信公众号整体平均阅读量表征智库观点的传播广度[24]。条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高校智库官网、官方微信号、媒体报道等渠道。

3　数据分析

3.1　数据校准

采用直接校准法将 18 个案例中 6 个变量指标的数据转化为模糊隶属度，每个变量条件的 95%、50%、5%分位数作为划分隶属、模糊交叉点和非隶属的阈值标准，在 fsQCA4.0 软件中运用 Calibrate 函数对原始数据进行转化，得到的模糊集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变量的数据校准

变量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研究人员规模	70.450	36.000	15.100
学科优势	0.798	0.121	0.006
组织架构	6.750	4.500	1.000
数据库建设	4.150	1.000	0.000
专题会议	10.300	3.750	1.000
媒体传播	3 300	550	50.000
决策影响力	5.000	3.500	1.000

3.2　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所有前因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 0.9 且无负值，因此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提升并不存在必要条件，需要将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 6 个条件变量的组合形式作为驱动方式开展进一步探索。

3.3　组态分析

对不能单独作为必要条件的各要素展开组态分析，将组态分析的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800，频数阈值设置为 2，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7，结果如表 4 所示。高决策影响力组态的整体一致性为 0.852，整体覆盖度为 0.547；前因组态包括三组，一致性都大于可接受标准 0.8。H1～H3 组态分别解释了 37.9%、32.7%、16.8%的案例，仅由 H1～H3 组态解释的案例占总案例的比例分别为 15.9%、8.9%、6.0%。

表 3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高决策影响力		非高决策影响力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研究人员规模	0.557	0.635	0.629	0.600
～研究人员规模	0.649	0.677	0.617	0.538
学科支撑	0.618	0.717	0.581	0.564
～学科支撑	0.624	0.641	0.709	0.608
组织架构	0.509	0.647	0.580	0.617
～组织架构	0.699	0.666	0.668	0.533
数据库建设	0.712	0.822	0.483	0.466
～数据库建设	0.538	0.554	0.816	0.703
专题会议	0.650	0.726	0.530	0.496
～专题会议	0.549	0.583	0.707	0.628
媒体传播	0.607	0.710	0.571	0.549
～媒体传播	0.558	0.603	0.695	0.614

注：～表示逻辑非。

表 4　智力资本组合作用于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组态路径

条件变量	H1	H2	H3
研究人员		⊗	
学科支撑	●	●	●
组织架构		●	●
数据库	•	●	
专题会议	●		•
媒体传播	●	•	●
一致性	0.892	0.821	0.868
原始覆盖度	0.379	0.327	0.168
唯一覆盖度	0.159	0.089	0.060
整体一致性		0.852	
整体覆盖度		0.547	

注：●为边缘条件存在；⊗为边缘条件缺失；●为核心条件存在；⊗为核心条件缺失。

H1 组态为知识网络驱动型，表明强有力的学科支撑下，通过大规模举办专题会议，精心策划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渠道，扩大智库观点的传播，辅以相对完善的数据库建设，可以推动智库形成高决策影响力。H1 组态的核心驱动力是由高频传播和多元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资本，优势学科作为知识的“发声器”，引领议题研究，产生的知识由智库向政策圈和公众单向扩散辐射。该组态的典型代表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它依托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突出优势，通过高频会议形成“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朗润·格政”“国家发展论坛”“承泽论坛”等一系列国内高质量品牌论坛，有效促进政策讨论。构建广泛触达机制，其公众号拥有超 20 万粉丝，每周发布 3～5 篇高质量智库文章，累计阅读超 500 万次，持续推动公共理性与社会启蒙。积极拓展对话渠道，牵头组织“中美经济二轨对话”“中美健康二

轨对话”等智库交流,与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机构合作推出《中国 2049》《数字金融革命》等重大研究报告,医改方案、乡村振兴战略、电信改革、平台经济等多项成果被转化为国内实际政策。

H2 组态为知识内化反馈型,表明小核心型的优势学科研究团队,通过完善研究中心设置,持续滚动更新专题数据库,辅以媒体渠道扩散,可以提高决策影响力。H2 组态的核心驱动力是由精细化组织和专题数据库构成的结构资本,多学科作为知识的“过滤器”,交叉验证政策可行性,产生的知识在智库内部循环优化后形成闭环反馈输出。该组态的典型代表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近年来,它依托下设的金融科技与安全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中心等 24 个研究中心,积极开展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其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覆盖 1978 年至今的宏观经济方面数据,包含 GDP、投资、消费、贸易等 200 多个指标,截至 2023 年,数据库数据量超过 80 万条,访问量达 8 万次,深度支撑决策服务,13 份决策咨询报告获总书记批示,17 份获总理批示,54 份获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批示,实现精准政策输入。从官方网站可见,其内刊《双周政策分析简报》紧随科技政策与产业前沿,定期更新最新研究成果。

H3 组态为知识联动赋能型,表明通过细化研究领域,完善组织架构,持续扩大智库观点的媒体传播,辅以较强的学科支持和较频繁的专题会议研讨,可以促进智库决策影响力的提升。H3 组态是由结构资本和社会资本双向联动驱动,多研究中心网络形成知识转化枢纽,国际学术与政策共同体构成跨国知识池,学科优势作为知识的“变压器”,实现不同学科在政策应用中并网输出。该组态的典型代表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其下设巴基斯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清华-奥美公共品牌战略研究室、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室等 8 个细分组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传媒研究学术网站和第一个网络新闻实验室,持续发布蓝皮书系列《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定期举办“清华国际传播论坛”,邀请国内外学者与实务专家研讨前沿议题,长期为中央和国家机关提供舆情分析、国际传播策略等内参报告,多份研究报告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直接服务于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的制定,如在中美关系、冬奥会传播等重大国际事件中提供舆情研判。

3.4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有三种办法,即改变校准、调整一致性阈值以及增删案例[25],将校准分位数调整为 90%、50%、10%后,条件组态一致性水平均保持在 0.8 以上,与调整前的分析结果一致,说明上述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　结论与建议

高校智库在连接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方面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本文从智力资本的动态整合视角出发,系统探索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前因驱动机制,为破解智库建设中的“效能瓶颈”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路径。不同于传统单因素分析,通过揭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复杂互动关系,展现了智库影响力提升的多元可能性,为高校智库建设提供更丰富的理论图景。

4.1　结论

(1)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提升并非由单一要素驱动,是多维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显示,智力资本框架下的任一要素均无法成为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的必要条件,组态分析获得三条殊途同归的提升路径,分别是知识网络驱动型、知识内化反馈型和知识联动赋能型,三种提升路径共同验证了人力资本中的学科优势是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形成的基础,结构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组合决定智库发展的方向。知识网络驱动型以“高频传播+大众化输出”扩大影响力半径,知识内化反馈型通过“数据沉淀+精准对接”实现政策闭环,知识联动赋能型依托“内部渗透+跨组织网络”推动理论政策双向转化。

(2)高校智库服务决策的基础在于知识生产的能力,决策影响力的提升是人力资本积累与转化的体现。研究并未发现智库研究人员的规模扩大对人力资本有明显的增量作用,这源于大多数智库聚焦某项研究领域,专家的知识高度重叠,单纯人数的叠加难以带来人力资本质的飞跃。然而,研究发现高校智库背靠的学科实力发挥关键作用,知识网络驱动型和知识内化反馈型均在优势学科的牵引下配合高社会资本或高结构资本驱动高校智库服务决策的影响力提升。即便在知识联动赋能模式下,结构资本和社会资本已实现较高程度的积累,也离不开学科优势发挥的辅助作用。

(3)高校智库服务决策的支撑在于知识管理的效能,决策影响力的提升是结构资本系统化建设成效的映射。在现有研究中,结构资本往往容易被忽略,但实际上,作为组织内部的知识管理体系和制度框架的外显,结构资本是智库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构成零件。研究发现智库组织架构的细化，不仅有助于研究领域的协同深化和创新能力的跃式提升，还能够更好地对接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需求，提供精准而多样化的决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另外，专题数据库的建设也已成为高校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构建专业数据库、案例库和知识管理系统，有助于提升研究效率的同时，基于数据的定性分析让产出的决策咨询成果也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4)高校智库服务决策的延伸在于知识网络的构建，决策影响力的提升是社会资本情境化运用的彰显。在中国特色的决策体系中，高校智库的政策参与深度依赖于社会资本的两个核心维度：专题会议构建的政产学研协同网络和媒体传播形成的立体化扩散渠道。过程视角来看，智库影响力提升不仅取决于研究成果的质量，更关键的是通过社会资本的情境化运用实现双重机制：专题会议通过创设多方对话平台，促成决策部门与行业专家的深度互动，精准对接政策需求，加速知识转化；多层次传播体系深度融合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的优势，突破“知识-政策”壁垒，有效扩大影响力甚至直接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

4.2 建议

结合上述研究发现，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提出优化高校智库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决策影响力提升的关键策略。

(1)创新人才培育，锻造学科优势。目前大部分高校智库吸纳了大量的校内外兼职研究者，采用的是“小核心、大外围”的模式。但校外专家因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深度参与智库决策服务；校内研究人员受院系考核框架限制，难以平衡教学、科研与智库职责。应建立独立的智库考核体系，将决策咨询成果纳入职称评定和绩效考核范围，激励研究人员积极参与智库工作。同时，深刻认识到人才培养的侧重点，建立专门的政策研究培训体系，提高研究人员的政策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决策需求。另外，可结合自身学校特色与区域发展需求，明确智库重点研究领域，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加大校内学科资源整合力度，打造高水平科研平台，构建跨学科协同创新机制，实现学科优势的进阶，是高校智库应对复杂政策问题的关键所在。

(2)完善制度构建，强化数据支撑。深化对结构资本在高校智库可持续发展中关键作用的认知，一方面，作为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的组织载体，设立多个研究中心，针对不同社会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专业化、精细化研究体系，同时，加强研究中心间的协同合作，推动知识壁垒的突破，助推服务决策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数据库建设，据CTTI统计，目前高校智库中，已经建库或正在建库的约占6%。充分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围绕智库的研究方向和决策咨询需求，开发智能、便捷的数据库平台，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实现政策研究数据资源的动态更新与多维整合，切实提升数据资产在决策支持中的转化效能。

(3)拓展传播渠道，构建协同网络。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通过PC端、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的整合，构建多端传播网络。完善自身网络平台建设，建立调研版块和友情链接，对智库动态、会议记录、调研成果等及时进行更新。另一方面，通过定期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等活动，建立与政府、官方智库、社会智库、企业的常态化合作机制，紧密结合研究成果与政府工作开展情况，扩大与民众的沟通空间，将专业研究成果通过大众化的语言、多元化的形式，转化为民众能够理解的内容，增强政策的社会认同度，提升政策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席亮，应验，贾宝余. 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建设研究——基于系统工程和科学传播等视角[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2)：333-341.

[2] 唐娜. 政策过程理论视角下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策略研究[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6(5)：76-81.

[3] 刘健，陈竣. 高校图书馆“一带一路”智库建设影响因素与实施策略研究[J]. 图书馆，2025(3)：111-121.

[4] 邹然. 社会智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功能、困境和进路[J]. 科技和产业，2024，24(12)：136-142.

[5] 胡薇，牛鸣灏. 我国社会智库影响力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组态效应分析[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5[2025-10-13].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1110.1727.002.

[6] MCGANN J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OL]. (2021-01-28)[2025-04-30]. https://repository.upenn.edu/handle/20.500.14332/48577.

[7] 刘娇，王慧英，李明. 省级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深层矛盾，定位优化与创新发展[J]. 现代教育管理，2023(12)：1-9.

[8] 陆红如，陈雅，梁颖. 国内外智库研究热点定量分析语境下的我国智库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 图书馆，2017(1)：9-16.

[9] 肖欢，刘晓丽. 美国六大智库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决策影

响力评估[J]. 国家安全论坛，2023(6)：68-85.
[10] JU J. How open innovation drives intellectual capital to superior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evidence from China's ICT sector[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23，24(6)：1464-1484.
[11] 蔡文君，申静. 创新驱动的智库知识服务全球专业化发展研究——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J]. 情报科学，2023，41(5)：81-90.
[12] 邓志超，朱宁波. 高校智库服务决策的模式构建与高质量发展——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视角[J]. 教育科学，2024，40(1)：29-35.
[13] 曹婷慧. 知识动员视角下高校智库影响力提升研究[J]. 江苏科技信息，2024，41(17)：49-54.
[14] PEREIRA V，BAMEL U. Extending the resource and knowledge based view：a critical analysis into its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1，132：557-570.
[15] 饶远. 科技智库知识创新人才网络研究——以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为例[J]. 科技和产业，2024，24(8)：42-48.
[16] 郭禹辰，冯雷. 专家参与决策的影响力差异何以出现？——基于S市城市微更新项目的考察[J]. 公共管理学报，2024，21(2)：53-64.
[17] 喻登科，张婉君. 企业组织知性资本、知识管理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绩效[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9)：122-131.
[18] 陈峰. 能源强国建设背景下央企新型智库人才机制建设的思考[J]. 科技和产业，2025，25(15)：292-298.
[19] 刘青，郭嘉如，赵岫岫. 我国高校新型智库能力提升对策研究——基于智库成果的分析[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5，10(1)：105-113.
[20] 刘大伟，庄欣琏. 高校智库何以高质量发展：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 江苏高教，2024(10)：10-15.
[21] PAPPAS I O，WOODSIDE A 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guidelines for research practice i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rke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21，58：102310.
[22] 解德渤，张晓慧. 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的世界坐标与未来抉择——基于软科2017—2021年世界一流学科排名的数据分析[J]. 现代教育管理，2023(2)：32-44.
[23] 马晓宁. 提升地方高校智库传播力的路径探索——基于Q市高校的调查与思考[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4，9(1)：98-105.
[24] 肖茜，钟周，许馨匀. 新时代高校智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创新探索——清华大学案例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22(7)：8-14.
[25] SCHNEIDER C Q，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How Does Intellectual Capital Configuration Empower Policy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s? A fsQCA-based Empirical Study

JU Jia

(Capital Lifelong Education Research Base，Beijing Open University，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As a pivotal organizational form of China's new-style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university-affiliated think tanks have made substantial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will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formulation. Currently in a golden era of development，these institutions nevertheless face the pressing challenge of addressing the "high quantity but low efficacy" dilemma in policy advisory services. Through bot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the inherent congruence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framework and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s was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d. By developing a tri-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human-structural-soci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apply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o examine 18 Beijing-based university think tank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ree archetypal models for enhancing think tank impact such as knowledge-network-driven model，knowledge-internalization-feedback model and knowledge-linkage-empowerment model. It confirms disciplinary advantage as a core element，while demonstrating context-dependent effectiveness through combinatorial alignment with intellectual capital configurations. These findings not merely exten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theory in policy sciences，but also provide implementable strategy frameworks for tailored think tank development，offering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policy advisory functions.

Keywords：university think tanks；policy influence；intellectual capital；fsQCA